



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邓绍兵

摘要: 农书写作在近代早期英国的兴起是英国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近代早期的英国在人口、农业、教育和观念等方面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为农书写作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近代早期英国农业作家的人数和新农书的数量不断增加。农书写作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尽管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中仍然存在可疑的或荒谬的内容,但是它们包含了大量实用、易懂的内容,且在乡绅中拥有较多的读者。据此可以认为,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具有实用价值,在一些地方充当了传播农业技术的媒介。农书写作的兴起也因而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 近代早期; 英国; 农书写作

农书(farming books)是传播农业技术的一种重要媒介。在英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由英国农业作家写作的农书出现于 13 世纪,其中,沃尔特·德·亨利(Walter de Henley)的《农书》(Le Dite de Hosebondrie)最为有名。不过,此时农书的数量极为有限,而且之后的两个世纪英国人没有写作农书^①。到近代早期,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英国涌现了许多农业作家,这些作家写作了大量的农书。这无疑是英国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在英国农业史研究的初期,英国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上述现象,即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并详细考察了农书写作与出版的情况^②。关于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兴起的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革有关,如琼·瑟斯克认为,近代早期英国农书的增多是由人口增长及其所导致的食物需求的增长而引起^③。至于农书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发展的意义,学界则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厄恩利勋爵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书的价值持否定态度,而瑟斯克则肯定了近代早期英国农业作家写作农书的能力和其所写作的农书的价值^④。二者的观点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歧迄今未能解决。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背景、表现和意义三个方面着手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做进一步的考察,进而加深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发展的理解。

① 参阅 G. E. Fussell.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West European Farming*.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82.

② 如: Donald McDonald. *Agricultural Writers from Sir Walter of Henley to Arthur Young, 1200 - 1800*.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08; G. E. Fussell. *The Old English Farming Books from Fitzherbert to Tull, 1523 to 1730*. London: Crosby Lockwood & Son, Ltd., 1947.

③ Joan Thirsk. "Farming Techniques", in Joan Thirsk(ed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IV, 1500 - 16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61.

④ 参阅: Lord Ernle. "Obstacles of Progress", in E. L. Jones(eds.).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650 - 1815*.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7, pp. 50~51; Joan Thirsk.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Their Diffusion", in Joan Thirsk(ed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V, 1640 - 1750: Agrarian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33~581.

一、农书写作兴起的背景

近代早期是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期间,英国在人口、农业、教育以及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为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口呈现出了迅速增长的趋势。根据人口史家 E. A. 里格利和 R. S. 斯科菲尔特的研究,1541 年英格兰的人口约为 277 万,1601 年约为 410 万,1651 年约为 522 万,1701 年约为 505 万,1751 年约为 577 万^①。与中世纪晚期相比,近代早期英国人口增长了大约 2 倍。随着总人口的迅速增长,英国的城市人口也不断地增长。1524 年,人口超过 4000 的城市有 10 个,其中,仅有伦敦和诺里奇两个城市的人口过万。到 1688 年,8 个城市的人口过万,22 个城市的人口介于 5 000 到 10 000 之间。在近代早期英国的诸多城市之中,伦敦的人口增长尤为显著:1539 年,它拥有大约 6 到 8 万人口;1605 年,它拥有大约 20 万人口;1695 年,它拥有大约 57.5 万人口^②。同时,英国乡村地区非农业人口也不断地增长。根据里格利的研究,1520 年,英格兰乡村地区非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18.5%;1600 年,约占 22%;1670 年,约占 26%;1750 年,约占 33%。^③

由于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与乡村地区非农业人口)的增长,英国国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例如,1534 年,伦敦在面包和饮料方面消耗了 15 万夸特谷物;1605 年、1661 年和 1696 年,伦敦在这两方面所消耗的谷物量分别达到了 50 万夸特、115 万夸特和 132.5 万夸特^④。受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的影响,近代早期英国农产品的价格也明显上涨。“假如把 1450 至 1499 年这个时期看作起点(价格指数定为 100),到 1640 至 1649 年这个时期,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已经上涨到了 644。”^⑤跟 1500 至 1650 年这个时期相比,1650 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谷物和畜产品的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 12.1% 和 4.9%,而牲畜的价格指数则上升了 17.6%^⑥。考虑到前一时期的英国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后一时期谷物和畜产品的价格虽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英国农业在近代早期日益商业化,逐渐从谋生型转向谋利型。在这样的农业环境中,英国的农业生产者渴望获得新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产量满足不断膨胀的市场需求,从而增加收入。

其次,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还得益于发生在农业领域的其它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土地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投资渠道,不仅可以带来财富,还可以提高威望和社会地位,所以,在近代早期的英国,许多从事商业或制造业的人、担任律师或公职的人、或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会购买土地^⑦。例如,“都铎王朝初期最富有的商人理查德·格雷沙姆(Richard Gresham)花费 1.1 万多英镑购买方廷斯修道院(Abbey of Fountains),据说在其去世时土地的年度价值是 800 英镑。”^⑧1560 年伦敦商人约翰·艾沙姆(John Isham)购买了北安普敦郡的兰波特庄园(manor of Lamport)^⑨。购买土地之后,这些原本从事非农业职业的人希望通过妥善经营手中的地产来达到自己购买土地的目的。但是,“他们不久意识到,除非他们最大程度地依赖仆人,否则他们必须再次上学,学习怎样管理新财产”^⑩。于是,为

① E. A. Wrigley &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08~209.

② 数据来源: Ken Powell & Chris Cook. *English Historical Facts: 1485—1603*.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7, p. 198; Chris Cook and John Wroughton. *English Historical Facts: 1603—1688*.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p. 226.

③ 数据来源: E. Anthony 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85, 15(4), p. 700.

④ Norman Scott Brien Gras.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5, p. 77.

⑤ Joan Thirsk(ed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IV, 1500—1640*, p. 594.

⑥ Joan Thirsk(ed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V, 1640—1750: Agrarian Change*, p. 1.

⑦ 参阅 F. J. Fisher. “Tawney’s Century”, in F. J. 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In Honour of R. H. Taw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0; D. C. 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5, 127.

⑧ Peter Ramsey.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63, p. 130.

⑨ Penry Williams. *The Later Tudors: England 1547—16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91.

⑩ H. S. Bennett. *English Books & Readers, 1603—1640: Being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Trade in the Reig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50.

了妥善经营手中的地产,他们也渴望获得关于农业的知识。例如,塞缪尔·考克斯(Samuel Coxe),威尔特郡的一个教区牧师,在 1652 年 8 月给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写信。他告诉后者他已经做农夫五个月了,还说自己以前从未做过农夫。他想知道廉价地购买到三叶草种子的最佳时间,并已给克雷西·戴莫克(Cressy Dymock)写信寻求建议^①。另一方面,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业技术受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和低地国家农业的影响而不断革新。根据英国农史学家埃里克·克里基的研究,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业技术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草—田轮作农业、湿地排水、肥料、灌水草地、新休耕作物的引入与牲畜饲养^②。农业中新技术的出现与改良,不仅促进了英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还为当时倡导农业改良的作家提供了农书写作的素材。

第三,农书写作的兴起要求较多的人具备读写能力,而近代早期英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这一条件。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用于教育的资金明显增加,新建学校也较多。“据估计,在 1560 年至 1640 年之间,个人提供的用于建立文法学校的资金超过了 29.3 万英镑,而且[英国]在 1603 年至 1649 年之间建立了 142 所新的文法学校。”^③近代早期英国人的读写能力因此而不断提高。根据社会史家的研究,“16 世纪中叶,20%的男人和 5%的妇女或许能够写他们的名字;到 17 世纪中叶,30%的男人和 10%的妇女具备了这一能力;到 1715 年,该比例已各自上升到 45%和 25%;而到 1760 年,大约 60%的男人和 40%的妇女能够写他们的名字。”^④乡绅是近代早期英国农业作家的主要来源。就乡绅阶层来看,他们的读写能力提高得更快。例如,“在达拉姆的教会法庭中,1565 至 1573 年间,30.5%的绅士证人是文盲,但这些文盲绅士大部分是老人。到 1626 至 1631 年,达拉姆乡绅完全具备了读写能力。”^⑤可以说,教育的发展既为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提供了更多潜在的作家,又提供了更多潜在的农书读者。

最后,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还跟当时英国人的观念有关。夏普认为,在乡村社区中,“尽管存在关系紧张的证据,但显然人们对他们的同类有一种相互的责任感、邻里感和关爱。”^⑥这种观念也在农业作家的观念中得到了体现。如瑟斯克分析的那样,“人文主义与共和理想融合在对一个政治目标的支持中:[农业]作家认为,假如来自国外的新耕作方法与新农作物得到更好的宣传,他们的同胞将从土地中谋得更好的生计。”^⑦农业作家约翰·史密斯的一番话作了更好的诠释。他说:“既然没有什么比农业更有用,那么王国与政府的繁荣主要取决于对乡村事务的良好管理;[我]把向国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可以改进他们的诚实劳动和产业的方法的指导看作是我对国家应尽的一种必要的责任。”^⑧伯斯利特(Berthlet)在《农书》(The Booke of Husbandry)1534 年的版本中说,菲茨赫伯特(FitzHerbarde,即 Fitzherbert)编写该书是出于“对这个最高贵的共和国的仁慈与热忱”^⑨。可见,近代早期英国人的观念也对农书写作的兴起有重要影响。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农书写作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兴起并不断发展。

二、农书写作兴起的表现

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较为直接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作家的人数跟中世纪相比明显增多。根据唐纳德·麦克唐纳提供的英国农业文献索引进行粗略的统计,16 世纪有 13 位农业作家写作农书;1601 年至 1650 年有 18 位农业作家写作农书;1651 年至 1700 年有 46 位农业作家写作农书;

①Joan Thirsk(ed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V, 1640—1750: Agrarian Change*, p. 551. 哈特利布与戴莫克都是 17 世纪英格兰的农业作家。

②详见 Eric Kerridg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8, pp. 181~325.

③Barry Coward.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England 1550—1750*, Revise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7, p. 86.

④J. A. Sharpe.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2nd edition. London: Arnold, 1997, pp. 277~278.

⑤Keith Wrightson.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London Routledg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8.

⑥J. A. Sharpe.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p. 96.

⑦Joan Thirsk. “Plough and Pen; Agricultural Writ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 H. Aston, P. R. Coss, Christopher Dyer & Joan Thirsk(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as: Essays in Honour of R. H. Hil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00.

⑧John Smith. *Profit and Pleasure United, or the Husbandman's Magazine*, London: 1684, p. a2.

⑨转引自 Lord Ernle.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9, p. 90.

1701年至1750年大约有35位农业作家写作农书^①。在这100多位农业作家之中,大多数人写作农书的数量在10本以下(普遍是1、2本),而仅有少数人写作了10本以上的农书。尽管如此,在这些农业作家之中,农业知识丰富者也不乏其人。前已提及的菲茨赫伯特便是其中之一。他是近代早期英国写作农书的第一人,于1523年出版了两本凭借其40多年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写作而成的农书:《农书》(The Boke of Husbandry)和《土地测量与改良之书》(The Boke of Surveyinge and Improvements)^②。前书是一本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的实用小册子,后书则是一篇关于地主与佃户之关系以及地产经营之最佳方法的论文。除菲茨赫伯特之外,近代早期的英国还出现了不少农业知识丰富的农业作家,比如:托马斯·塔瑟(Thomas Tusser)、杰维斯·马卡姆(Gervase Markham)、罗兰·沃恩(Rowland Vaughan)、加布里埃尔·普拉蒂斯(Gabriel Plattes)、约翰·沃利奇(John Worlidge)、沃尔特·布利斯(Walter Blith)、塞缪尔·哈特利布、约翰·莫蒂默(John Mortimer)、理查德·布拉德利(Richard Bradley)和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等。二是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新农书的数量不断增加。根据美国学者沙利文的统计,在英格兰,1521年至1550年仅有1种农业技术手册(Farming Technical Manuals)初次出版;1551年至1600年也仅有11种农业技术手册初次出版;1601年至1650年有43种农业技术手册初次出版;1651年至1700年有83种农业技术手册初次出版;1701年至1750年有133种农业技术手册初次出版^③。这些数据未必绝对准确,但是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足以说明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同时,农书写作形式与写作内容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先就农书写作的形式而言,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业作家既写作了包括种植业、畜牧业乃至林业、渔业等在内的综合性农书,又写作了仅仅涉及农业生产某个方面的专业性农书。菲茨赫伯特的《农书》不仅是近代早期英国的第一部新农书,还是第一部综合性农书。它的内容涉及到了种植业、畜牧业、林业以及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除《农书》之外,综合性农书还不时出现,如1573年托马斯·塔瑟出版的《五百条好农业点子》(Fiue Hundreth Pointes of Good Husbandry)、1649年沃尔特·布利斯出版的《英国改良者》(The English Improver)和1669年约翰·沃利奇出版的《系统农业》(Systema Agriculture)等。近代早期专业性的农书则更为常见,如1587年伦纳德·马斯科尔(Leonard Mascall)出版的《第一本关于牛的书》(The First booke of cattell)、1625年杰维斯·马卡姆出版的《肯特郡威尔德地区的土地改良》(The Inrichment of the weald of Kent)、1664年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出版的《森林》(Sylva)和1741年亚历山大·布莱克韦尔(Alexander Blackwell)出版的《改良粘、湿且贫瘠之土地的新方法》(A New Method of Improving Cold, Wet, and Barren Lands)等。

再就农书写作的内容而言,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始终是近代早期英国农业作家写作的主要内容。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农业生产中的革新也成为许多农业作家写作农书的主题。例如,1610年罗兰·沃恩出版《广泛认可且早已应用的灌水工程》(Most Approued, and Long Experienced water-works),介绍灌水草地或牧场的建设。1663年安德鲁·亚兰顿(Andrew Yarranton)出版《三叶草给土地带来的巨大改良》(The Great Improvement of Lands by Clover),介绍种植三叶草的原因、土地以及方法等。可以说,农书写作的内容几乎已经涉及到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各个方面。此外,农业作家还经常就农业生产中的某些方面提供新的改良技术,并将其写入农书。他们在农书中推荐的各种新播种

①数据来源:Donald McDonald, *Agricultural Writers from Sir Walter of Henley to Arthur Young, 1200—1800*, pp. 199~210。由于西方学者对农业范围的界定不一致,或收集信息的完整程度不一样,所以关于农业作家人数或初版农书数量的统计结果会存在一定的出入。麦克唐纳提供的农业作家中包括非英文农书的翻译者。

②关于这两本农书的作者,西方学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其作者应该是约翰·菲茨赫伯特(John Fitzherbert);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作者是约翰·菲茨赫伯特的弟弟,即安东尼·菲茨赫伯特(Anthony Fitzherbert)。详见Donald McDonald, *Agricultural Writers from Sir Walter of Henley to Arthur Young, 1200—1800*, p. 13; G. E. Fussell, *The Old English Farming Books from Fitzherbert to Tull, 1523 to 1730*, pp. 5~6。本文无意澄清两本农书的真正作者,故在文中仅用“菲茨赫伯特”称呼其作者。

③数据来源:Richard J. Sullivan, “Measurement of English Farm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1523—19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1, 1984, p. 274。沙利文的统计数据出自W. 弗兰克·珀金斯的《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农业作家》(W. Frank Perkins, *British and Irish Writers on Agriculture*, Lymington: Chas. T. King, 1932。)一书。与同类书籍相比,该书收集的农书信息最为详尽,涉及到的主题包括:农业化学、植物学、牧草与野草、排水、改良、度量衡、昆虫学与传记。关于林学、园艺、土地测量、家禽与蜜蜂等主题的农书则被排除在外。而且,该书不仅列举了各种农书初次出版的年份,还列举了随后再版的年份。参阅Richard J. Sullivan, “Measurement of English Farm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1523—1900”, p. 282。

技术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600年休·普拉特(Hugh Plat)出版《点播谷物的新优良技术》(*The New and Admirable Arte of Setting of Corn*),建议播种时用点播代替撒播,并介绍了四种点播谷物的方式。1669年约翰·沃利奇在其撰写的《系统农业》中推出了一款用于点播谷物的机具。1731年杰思罗·塔尔出版《新马拉锄农业》(*The New Horse-houghing Husbandry*),推出了自己设计的条播机^①。由此可见,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内容非常丰富。

总之,无论是近代早期英国农业作家的人数和新农书的数量,还是农书写作的形式和农书写作的内容,都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三、农书写作兴起的意义

那么,农书写作的兴起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到底有何意义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尚存分歧的问题,即农书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是否具有实用价值,亦即农书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能否充当传播农业技术的媒介。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相关史料的匮乏,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有多少人阅读过农书,也不清楚有多少人将农书作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尝试着从农书的内容、农书的读者和农书的再版情况判断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是否具有实用价值,进而探讨农书写作兴起的意义。

关于近代早期英国农书的内容,厄恩利勋爵认为,农业作家关于农业改良效果的“许诺常常言过其实,令人难以置信;一些有用的建议与其它荒谬的或者令人生疑的建议混在一起”^②。不可否认,某些农书确实存在上述问题。例如,农业作家阿道弗斯·斯皮德说,在伦敦周围15英里以内的地方,500英亩土地的年租金是200英镑。这些土地用来饲养兔子,可以实现2065英镑的年利润^③。利润如此丰厚,这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简直不可思议。又如,塞缪尔·哈特利布介绍了一种预防绵羊与马的肝蛭病(the Rot)的方法:“握住大毒蛇或者蝰蛇,切掉它们的头与尾巴,然后将剩余部分晾干变成粉末。将这种粉末与盐混合,然后偶尔给你的马和绵羊喂几粒如此混合而成的颗粒;这能有效地预防它们的大多数疾病,尤其预防脂肪肝蛭病。”^④该方法是否真的有效,不得而知,但它着实让人生疑。或许正是因为早期的农书中还存在诸多类似的内容,经济史家E. L. 琼斯也较为悲观地看待1650年以前英国农业作家写作的农书。他说,17世纪中叶以前,“尽管开始出现劝告农民改良其技术的小册子,但是可能还没有关于农业问题的科学知识。”^⑤

厄恩利勋爵和琼斯的确看到了农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而,事实上,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糟糕。早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英国约曼农的美国史家米尔德里德·坎贝尔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业作家及其农书的内容做了较为乐观的评价。她说:“根据现代的农业知识,他们的许多想法显得离奇古怪,甚至荒谬;尽管如此,他们的[农]书包含大量的实用信息。”^⑥从已经取得的农业技术史研究成果来看,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中确实包含了大量关于农业技术的实用信息。例如,巴特里斯和丹尼斯发现许多农书提供了改良谷物种子的技术;富塞尔发现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农书提供了许多用于提高土壤肥力的实用技术^⑦。而且,近代早期的英国人所留下的文字材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实际上比厄恩利勋爵和琼斯所说的好得多。例如,1723年莫尔斯沃思子爵(Viscount Molesworth)写到:

至于农业,我谦恭地建议每个郡都设立农业学校,以固定的年薪[聘请]精通英文教学法的

①关于各种新播种技术的细节,可以参阅拙文《近代早期英国农作物播种技术的改良》,载《中国农史》2013年第4期,第29~35页。

②Lord Ernle,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p. 111.

③参阅 Adolphus Speed, *Adam out of Eden*. London, 1659, pp. 2~5.

④Samuel Hartlib, *His Legacy of Husbandry*. London, 1655, p. 268.

⑤E. L. Jones,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E. L. Jones, eds,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650—1815*, p. 5.

⑥Mildred Campbell, *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83, p. 168.

⑦参阅 F. A. Buttress and R. W. G. Dennis, “The Early History of Cereal Seed Treatment in Engl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1947, 21(2), pp. 93~103; G. E. Fussell, “Crop Nutrition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1955, 3(2), pp. 95~106.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位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中仍然对农书中所介绍的实用技术的应用程度持保留态度。

教师在那里教学；并教男孩们阅读、抄写塔瑟的农书（而不是识字课本），且背诵它，为达到此目的，重印、分发该书；别让人反对它是古英语；我们不是教授字词，而是观念；我确信，该书是以往出版的关于好农业和家务的最佳英文书，适合下层人、农民和普通家庭之用。^①

从这条材料中不难看出：莫尔斯沃思子爵认为塔瑟的农书是一本内容非常好的农书，适合用作农业学校的教材，读者不要太在意该书所用的语言。应当指出的是，塔瑟的农书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不易理解，以致提到该农书的历史学家都称其为“蹩脚诗歌”。实际上，像塔瑟这样用诗歌的形式写作农书的例子在英国十分罕见，绝大多数农业作家都会尽可能地把农书写得容易为读者理解和接受。瑟斯克是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农业史的专家，她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书的肯定性评价也说明了这一点。她说：“当英国人在16世纪中叶开始写作他们自己的农书时，他们用准确实用的英语写作。几乎从一开始，他们的著作就极其新颖，或以经验为基础……而且，作家们迅速学着尝试一种容易为所有人理解的朴实的写作风格。”^②例如，杰维斯·马卡姆便是如此。他的书目编制人F. N. L. 波因特(F. N. L. Poynter)如是说，马卡姆“写得既仔细又清楚，而且似乎总是意识到他的写作所面向的读者不习惯于从书籍中获取指导，而习惯于得到口头上的指导”。结果，“马卡姆的书在他生活的时代是如此受欢迎，以致它们几乎被读得破破烂烂。”^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农书内容的初步认识，即近代早期英国农书中存在大量实用的内容，且农书易为当时人所理解。内容实用、易懂是农书具备实用价值的一个基本前提。虽然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已经具备了该前提，但它们毕竟只是农业技术知识的载体，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否具有实用价值，还取决于其是否拥有读者。那么，近代早期的英国存在一个愿意阅读农书并采纳其中建议的读者群体吗？

坎贝尔认为，“即便作最乐观的估计，约曼农也不过是拙劣的读者，再说他们就不是那种习惯于从书本中学习种田的人。”^④根据社会史家的研究，16世纪中叶大约40%的约曼农具备读写能力，到18世纪初该比例上升到了60%^⑤。这说明约曼农的读写水平并不差。但是，相关材料表明约曼农确实不大可能是农书的读者。如厄恩利勋爵所说，农业作家常常招致农民的轻蔑，被看作是像“江湖药贩”一样的人、“杂而不精的人”^⑥。而且，农业作家并不期待农民会采纳他们提出的关于农业改良的建议。例如，詹姆斯·唐纳森(James Donaldson)说农民很可能会这样回答他，“带着你的愚蠢想法离开；你的脑袋中怪念头太多了。我们会使自己欣然接受我们的父辈迄今所采用的办法。”^⑦又如理查德·布拉德利所说：假如我跟农民“讨论改良，他们会向我询问我是否会耕地，因为他们认为农业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⑧。上述材料说明，当时的农民并不相信农业作家所提供的建议。这是厄恩利勋爵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书的价值持否定态度的另一个原因。

约曼农尚且如此，约曼农以下的社会阶层就更不可能阅读农书了。但是，不能就此认为农书没有读者，因为近代早期英国的乡村社会中存在对农业知识的需求。坎贝尔和瑟斯克都认为，乡绅是农书的主要读者^⑨。如果她们的看法属实，那首先意味着许多乡绅拥有属于自己的农书。根据瑟斯克对地方档案的考察可知，许多乡绅在自家的图书馆中收藏了农书。例如，威廉·布罗克曼(William Brockman)是东肯特郡的一个乡绅，1742年他拥有一个图书馆。其中的农书包括：伊夫林的《森林》、杰维斯·马卡姆

① Robert Molesworth, *Some Considerations for the Promoting of Agriculture*, Dublin, 1723, pp. 30~31.

② Joan Thirsk, "Making a Fresh Start: Sixteenth-Century Agriculture and the Classical Inspiration", in Michael Leslie & Timothy Taylor(eds.), *Culture and Cultiv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Writing and the Land*,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0.

③ 转引自 Joan Thirsk(ed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V, 1640—1750: Agrarian Change*, p. 535.

④ Mildred Campbell, *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 p. 170.

⑤ J. A. Sharpe,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p. 278.

⑥ Rowland E. Prothero,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pp. 112, 133.

⑦ Rowland E. Prothero,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p. 134.

⑧ Richard Bradley, *A Complete Body of Husbandry*, London, 1727, p. 152.

⑨ Mildred Campbell, *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 pp. 169~170; Joan Thirsk, "Plough and Pen: Agricultural Writ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 H. Aston, P. R. Coss, Christopher Dyer & Joan Thirsk(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as: Essays in Honour of R. H. Hilton*, p. 301.

的著作、伦纳德·米吉尔(Leonard Meager)的《英国园丁》(*English Gardener*, 1670 年版)和约翰·沃利奇的《系统农业》(第 1 版, 1669 年版)。又比如温德姆·纳奇布尔爵士(Sir Wyndham Knatchbull), 他也是肯特郡的一个乡绅。1731 年他拥有一些较好的农书, 包括马卡姆的《乡村农场》(*Country Farm*)、理查德·布拉德利的新农书、约翰·莫蒂默的《农业技艺》(*Art of Husbandry*, 1707 年版)和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兽医的新指南》(*The Farrier's New Guide*, 1720 年版)等书^①。乡绅不仅收藏农书, 还研究农业、阅读农书。如 1601 年约翰·纽迪盖特(John Newdigate)决定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研究农业; 他必定还读过古奇(Googe)的通俗译本《四卷农书》(*The Four Bookes of Husbandrie*)^②。又如, 18 世纪 30 年代后期, 肯特郡的爱德华·菲尔默(Edward Filmer)爵士收到其种子商寄来的四种豌豆和关于各种豌豆的建议。他对照埃利斯(Ellis)的农书《奇屯山与山谷农业》(*Chiltern and Vale Farming*)中的信息核对种子商的建议, 并在他的账册中正确地记录了两套用法说明^③。可见, 乡绅是近代早期英国农书的主要读者。

而且, 相关证据表明: 农书中实用的建议在英国乡村中得到了采纳。例如, “1718 年的一份地产账册表明, 剑桥郡奇彭纳姆(Chippenham)的树篱栽种山楂, 海棠树和榆树散布其间, 正是遵循了约翰·莫蒂默在《农业的全部技艺》(*The Whole Art of Husbandry*, 1707 年版)中所推荐的方法。”^④由此说明, 近代早期的英国存在一个愿意阅读农书并将农书中的建议付诸实践的读者群体。

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是否具有实用价值? 答案已经明晰。不过, 为了使前面考察所得到的答案更加令人信服, 还有必要对农书的再版情况进行分析。因为从社会认可的角度来讲, 读者对某农书的需求是证明其具有实用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目前还无法确切知道近代早期英国的读者对农书的需求状况, 但是, 考察农书的再版情况却是了解当时的读者对其需求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西方学者的统计结果可知, 近代早期英国的许多农书多次印刷出版。例如: 菲茨赫伯特的《农书》在 1560 年之前印了 7 次, 到 1598 年时又印了 4 版。他的《土地测量与改良之书》到 1555 年时印了 8 次。托马斯·塔瑟的《一百条农业好点子》(*A Hundreth Good Pointes of Husbandry*)在内容扩充之前重印了 2 次, 而《五百条好农业点子》在 16 世纪结束前重印的次数不低于 11 次。到 1630 年时, 伦纳德·马斯科尔的《第一本关于牛的书》至少重印了 8 次^⑤。杰维斯·马卡姆于 1625 年初次出版《肯特郡威尔德地区的土地改良》, 到 1695 年该书已重印了 11 次^⑥。约翰·沃利奇的《系统农业》在其一生中经历了 5 个版本^⑦。从这些数字明显可以看出有农书曾多次再版。至于再版农书的种类多, 则可以从各个时期各种农书再版的总次数中略知一二。根据沙利文的统计, 在英格兰, 1521 至 1550 年农书再版的次数共计 6 次; 1551 至 1600 年农书再版的次数共计 33 次; 1601 至 1650 年农书再版的次数共计 50 次; 1651 至 1700 年农书再版的次数共计 77 次; 1701 至 1750 年农书再版的次数共计 73 次^⑧。农书再版的总次数不断增多, 而 17 世纪以后, 随着农书种类的不断增多, 大多数农书再版的次数趋于减少。与各个时期初版农书的数量相比较, 还可以发现: 在各个时期出版的农书中, 再版农书占了很大的比例。显而易见, 近代早期英国的读者认可了当时出版的农书并对其有较多的需求。这再次说明农书中包含了大量实用的内容、农书读者的存在, 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农书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具有实用价值。

既然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具有实用价值, 那么, 尽管如瑟斯克所说, “[农]书还没有多到司空见惯的

① Joan Thirsk.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Their Diffusion”, in Joan Thirsk (ed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V, 1640—1750: *Agrarian Change*, p. 572.

② Felicity Heal & Clive Holmes. *The Gentry in England and Wales, 1500—17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09.

③ Joan Thirsk (ed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V, 1640—1750: *Agrarian Change*, p. 571.

④ J. H. Harvey. “Hedges and Local History”, *Local Historian*, XII, 2, 1976, p. 84. 转引自 Joan Thirsk (eds.).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V, 1640—1750: *Agrarian Change*, p. 572.

⑤ H. S. Bennett. *English Books & Readers, 1558 to 1603: Being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Trade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90, 191, 193.

⑥ Joan Thirsk. “Plough and Pen: Agricultural Writ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 H. Aston, P. R. Coss, Christopher Dyer & Joan Thirsk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as: Essays in Honour of R. H. Hilton*, p. 305.

⑦ G. E. Fussell. *The Old English Farming Books from Fitzherbert to Tull, 1523 to 1730*, p. 68.

⑧ 数据来源: Richard J. Sullivan. “Measurement of English Farm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1523—1900”, p. 274.

地步”^①，但是，我们却不能否定农书写作的兴起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农书写作的兴起给英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许多具有实用价值的农书，这些农书在一些地方充当了传播优良农业技术的媒介，推动了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农书写作兴起的意义，有必要在此对农书影响农业技术发展的途径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首先，或许像菲茨赫伯特劝告年轻绅士时所说，乡绅应购买农书，阅读农书；根据一年之中的季节，将相关的章节读给仆人听^②。农书中的技术便首先在乡绅的地产上得到了应用。接下来，则如瑟斯克所说：“乡绅通过实例、通过约曼农和农夫能够看到并易于理解的田野示范传播[农书中的]信息。正是摆在他们眼前的这些示范说服农民模仿[乡绅的农业]。”^③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即农书写作是在人口、农业、教育和观念等方面发生变革的背景之下兴起。在农书写作兴起的过程中，农业作家的人数和新农书的数量都不断地增加。同时，农书写作的形式多样化，写作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尽管农书中仍存在诸多可疑的或荒谬的内容，但这并不能掩盖近代早期英国农书中存在大量实用、易懂内容的事实。乡绅是农书的主要读者，对农书有较大的需求。根据这些事实可以推断，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具有实用价值，在一些地方充当了传播农业技术的媒介。农书写作的兴起也因而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On the Rise of Farming-book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Deng Shaobing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a remarkable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griculture that farming-book writing ros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English population, agriculture, education and ideology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the farming-book writing. Thus, the numbers of agricultural writers and farming books kept increas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forms of farming-book writing were diverse and its contents were extensive. Although the farming books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still contained suspicious or ridiculous contents, lots of their contents were practical and readily understandable, and there were many of their readers among the gentry.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farming books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were valuable in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in some places acted as the medium of spread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e rise of farming-book writ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Key words: early modern period; England; farming-book writing

● 作者简介：邓绍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dengshaobing_001@163.com。

● 基金项目：2011 年度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 Joan Thirsk, "Plough and Pen: Agricultural Writ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 H. Aston, P. R. Coss, Christopher Dyer & Joan Thirsk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as: Essays in Honour of R. H. Hilton*, p. 295.

② 参阅 Fitzherbert, *The Book of Husbandry*, edited by Walter W. Skeat, London, 1882, pp. 90~91.

③ Joan Thirsk, "Plough and Pen: Agricultural Writ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 H. Aston, P. R. Coss, Christopher Dyer & Joan Thirsk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as: Essays in Honour of R. H. Hilton*, p. 301. 坎贝尔认为，尽管约曼农指责农业作家，但许多约曼农极细心地看护着他们的利益，并且与他们的地主一样急于学习如何提高他们的产量。参阅 Mildred Campbell, *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 p. 170.